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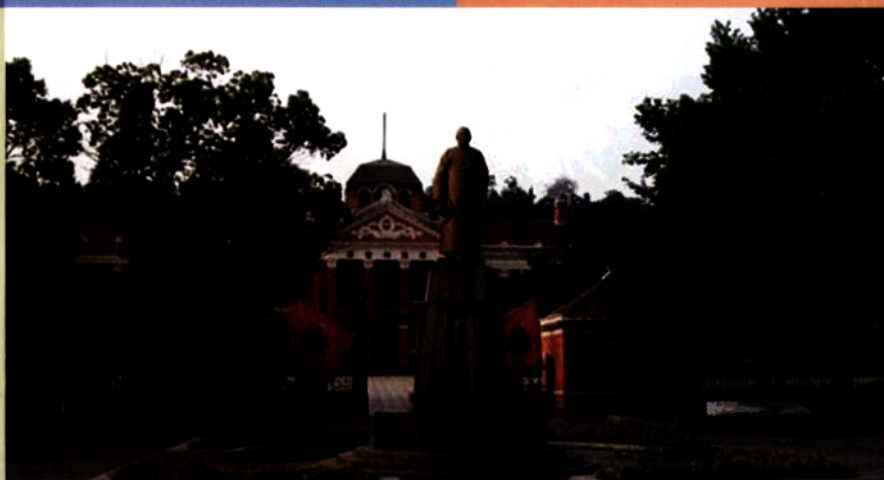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丛刊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3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辛亥革命史丛刊

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3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 13 辑/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216 - 05145 - 3

- I. 辛…
II. ①辛…②武…
III. 辛亥革命—研究—丛刊
IV. K257.07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334 号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 13 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21.25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插页:4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1 千字

印数:1 - 1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145 - 3

定价:5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3 辑)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章开沅

副主编 吴剑杰 严昌洪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中	王兴科	王定海	朱英
吴剑杰	严昌洪	陈昆满	陈钧
周 波	章开沅	商光敏	温健

目 录

序: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章开沅(1)
辛亥武昌首义史事考辨五则	冯天瑜(7)
张之洞与革新党	吴剑杰(21)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革命党人	萧致治(37)
论孙中山的武昌建都情结	苏全有(52)
首义与首应	
——辛亥两湖志士革命精神与相互支持	杨鹏程(60)
《鄂州临时约法》研究	邱远猷(80)
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考察	范小方 杨 磊(94)
孙中山对议会制度的探索与建构	刘 伟(109)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	
——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为	
线索	廖大伟(127)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初创	李卫东(152)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联邦主义	张继才(165)
论幕僚精英与辛亥革命	李英铨(178)
再论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	潘洪钢(195)
刘士骥案与保皇会内乱	
——基于《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报》的探讨 ...	彭 剑(218)

从青柳胜敏看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日本军人	赵 军(231)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	朱 英(258)
清末“外债”与辛亥革命	姚会元 王春雷(280)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城市建筑业	
——以民国初年的上海、汉口为例	徐凯希(292)
孙中山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关系中的伦理准则	陈 钧(309)
孙中山与盛宣怀银行建设思想之比较研究	
.....	郑成林 刘俊峰(324)
孙中山与弘扬民族精神	赵炎才(337)
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思想	阳信生 饶怀民(365)
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黄长义(380)
解读孙中山民族与国家理念之台湾情结	
.....	熊志勇 董文俊(398)
广东军政府时期的教育变迁与发展	
——民初中国教育转型的个案研究	周兴梁(416)
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严昌洪 黎 霞(455)
孙中山的考试思想及其影响	胡向东(477)
孙中山民政思想述论	教文蔚(494)
天演惊雷与辛亥思想的多元趋向	苏中立(512)
从殷海光的思想历程看三民主义的张力	何卓恩(529)
晚清朝臣文化与政治价值取向的两歧	
——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例证	田 彤(546)
辛亥首义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	湖北省社科联课题组(563)

关于辛亥文化资源开发的几点建议	毛 磊(593)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	王兴科(606)
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可行性研究	梁华平 严 威(621)
辛亥首义历史资源:汉台两地联系的文化纽带	张笃勤 董实忠(636)
首义文化资源述略	何 广(646)

序：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章开沅

今年是辛亥革命 95 周年，湖北省、武汉市都举办了各项隆重的纪念活动，大家都认为这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庆的预演。在学言学，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我们也认真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9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在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收入会议论文 37 篇，合计 42 万字。

本来，今年又是一个大忙年，国内国外几乎每个月都有若干大型学术会议，加以还有许多正在抓紧运作或即将结项的重要科研课题，我们起初对此次会议并未抱过高期望。但会议预告信息刚一发布，要求参加会议人数之众多与提交论文之踊跃，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而这些论文大多具有新的视野与新的视角，在史料发掘与理论、方法诸方面都显示出辛亥革命研究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这当然使我们更有信心去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庆。

但是，为了推动辛亥革命研究持续而健康的长期发展，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首先仍然是资料的搜集。

辛亥革命资料搜集，在过去 50 多年取得很大成绩，无论是档案文献、手稿信函，还是回忆录与田野调查，各种已出版的资料汇编已经蔚为大观。但是对于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料储量来说，继

续搜求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即以我们最近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资料新编》(8卷,500万字)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非是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不久前,法国白吉尔教授来我校讲学,还再三强调,经她选送的法国陆军部档案,仅仅是很小一部分。史扶邻教授提供的英国外交档案,本来即说明仅仅是作为样品,需要商订相关范围后再作进一步搜罗。可惜以后时势多变,彼此都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只有就已送来的这一部分加以编选。至于国内各地档案文献,我们也只限于把征集已久的辽宁、浙江、江苏、吉林、云南这一小部分资料收入编辑,更说不上什么全盘推进。不过,近读《清史编纂通讯》(2006年第13期),获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扫描影印《美国驻中国各地领事馆领事报告》,包括中国18个重要城市,全书共计16种,13万页,预计为每套244册。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档案文献出版大手笔,对于历史学者实乃莫大的福音。

但是,资料的搜集、编辑、出版,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丰沛的资源,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毕竟产生于对史料的正确运用。“史料即史学”一语尽管有其丰富的内涵,但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史学,两者的混同至少存在着文字表述的严重缺陷,而且可能形成不同程度的误导,甚至妨碍史学研究提升到较高的层次。然而,史料正确的运用又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对于史料首先还得认真进行鉴别、校勘,然后才能谈得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果连文本的真伪都弄不清楚,就贸然加以运用,那只能是以讹传讹,既难贴近历史真实,遑论正确理解。我们必须承认,与中国古代史相比,中国近现代史在史料的考订辨伪等方面,远远比不上中国古代史;而在中国近现代史范围以内,辛亥革命史又比不上太平天国史。就数量而言,辛亥革命相关文献资料又特别多,因此,我们在资料的整理与考订方面还需努力补课。我常常对中外同行说,仅全国政协所编的8本《辛亥革命回忆录》,如果加以考订辨正

恐怕也至少再出 8 大本。这些基础工作虽然繁巨,但却无法绕道而过,希望有更多的有志者以杨天石诸先生为榜样,如同“老吏断狱”那样,把一件一件史事彻底厘清。

其次,仍然需要正确理解史论之间的关系。

现今许多年轻学者喜言模式,特别是急于创造新论。殊不知“论从史出”,特定的模式总是源起于特定的史事与特定的语境。很难说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流传千古而不变的绝对真理。1949 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肆虐,肆意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适应某些政治需要的僵死教条,我们深受其苦且深受其害,严重妨碍史学的正常发展。现在切忌走上另外一个极端,把西方学者通过研究特定历史而形成的某些理论框架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简单地搬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以致经常出削足适履的流弊。殊不知通常所说的西方学者的“模式”,无非是一种视角、视野、方法和理论框架。它们本身就是因人而异与因事而异,经常在流动变化之中。新模式往往经过破老模式而立,新模式也确实有超越老模式的优长之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老模式就一无是处,就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起任何作用。例如,费正清借用汤因比的“刺激——反应”理论解释中国近代史,曾一度被作为“模式”而被众多学者采用。后经他的学生柯文审慎检验,认为过于强调外来因素,应该着重发掘中国因素来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于是又被一些学者奉为新的“模式”。但我总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刺激——反应”的历史事实仍然存在,因而在某些课题中仍不必排除费氏模式的运用。近些年,以王国斌、彭慕兰为代表的所谓“加州学派”,又有感于柯文模式的局限,认为有“中国中心论”之嫌,认为应有扩大为全球的视野,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与解释中国历史。这当然又前进了一大步,也是我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一直认真思考并强调的类似观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因素”与柯文模式的作废,因为在许多课题中(如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仍然需要强调中国

内在因素,甚至外来“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诸如此类的例证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其实,许多中外学者并未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可以成为普遍适用而且无需任何变异的公式,但凡真正的学者决不会表现如此的僭妄。就是 Paradigm(范式或模式)一词本身也不具备此种崇高意义,它源于 Parade,而 Parade 无非是指游行的行列;所以 Paradigm 又衍生为 Paradigmatic,可译为典型的、例证的,就文法而言则是变化例证的或变化表的。我认为可能是有些中国学者在运用此词语时任意夸张了或误解了,而这却又是现今学风流于浮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不愿在实证工作上下死功夫,从而凭借某个西方新“模式”加以史事铺陈,以期“短平快”出新论。这也就是报刊上某些文章自诩创新而名实不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一贯重视中外学术交流,尊重海外学者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们那些新的视角、视野与新方法、理论。但我也历来强调兼容并包,择善而从,既不可自我封闭,更不宜盲目崇拜,最好是努力融汇中外古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希望在学习西方学者的过程中,不仅限于理解与运用某些合理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摸清这些模式产生的源头,特别是作为这些模式主要支撑的理论基础(包括跨文化、跨学科的整合)与实证历程。余英时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家,在闲谈中曾告诉我,他每年都要花许多时间读西方哲学新著,意在竭力追踪其最新的发展。其实早在 1961 年,已故的黎澍先生亦曾谆谆教诲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学者,必须认真阅读一些中外哲学与哲学史的名著,以提升与改善自己的思辨能力。现在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学术有源流之分与境界之别,惟有因流溯源并追求融通,才能真正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辛亥革命论著早已是成千盈万,即以有代表性的佳构而言也堪称车载斗量,但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改进与提升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就整体格局而言,我们的辛亥革命研究仍然局限于就中国论中国,缺乏与其他国家、地区类似革命的比较研究,因而还很难说已经具有真正的全球视野。但如果不与西欧、北美、拉美、亚洲其他相类似的革命或民族运动相比较,我们又怎能厘清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共性与个性?辛亥革命本来发生在一个已经逐步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之中,但我们的研究至今仍然局限于国境以内,以致我们许多论著中的辛亥革命竟仿佛孤立于世界以外的一个岛屿,这种反差难道还应该继续存在吗?

中外许多有识学者都认为,辛亥革命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研究,应该作为一个更为全面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时期的社会制度史,包括经济制度史、政治制度史、外交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文化制度史、教育制度史、学术制度史等等,都需要认真地分别给以系统、全面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着力于此,且初步获得明显成绩,但空缺太多(如宗教、民族、风俗、艺术乃至医药等),仍然有待于更多有志之士持续努力。

人物研究曾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但大多数都是研究领袖和其他各地头面人物,而且又大多是逐个孤立研究。现在已有逐渐增多的研究者把眼光下移,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已经初步显示绩效。我在20年以前就曾指出:“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一个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我还补充说:“需要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对于那些中间的甚至是旧营垒的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和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说到底,就是希望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视线下移,重视底层,并且从个体延伸为群体。现今由于文献与口述资料发掘愈来愈多,已经为人物研究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辛亥革命研究过去还有一大缺陷,即往往容易局限于革命阵营方面的文献,甚至因此形成某些偏信与误区。特别是在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为了社会动员,往往宣传中容易夸大革命对象的负面因素,甚至有意加以“妖魔化”。因此,我们作为研究者,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对各个阵营的正反两面资料(包括文献与回忆)都加以严密的审视,必要时还得进行繁复考订,务求保持自身的客观与公正,努力寻求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陈述与解读。过去研究缺陷大多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甚至连资料的出版也要受政治观点的制约。现在我们已经处于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与口碑资料,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辛亥革命提供了极大方便。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以革命党自己的眼光来看辛亥革命,还应该放宽视野、转换视角,进一步研究清朝政府如何看辛亥革命,各级官员如何看辛亥革命,国内立宪派与海外保皇党如何看辛亥革命,国内各种社会群体如何看辛亥革命,海外华人各种群体如何看辛亥革命,乃至外国在华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及其他各类职业者如何看辛亥革命,……。只有把这些课题都研究得既深又透,辛亥革命研究才可以称得上进入成年臻于成熟。

当然,仅就上述这些课题而言,就不是一、两代学人所能全部完成,而这就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魅力历久而未稍衰减的原因之所在。有志者盍兴乎来!

寒冬岁暮,文债毕集,而昌洪督索尤严。信笔写来,聊以卒岁而已;非敢放言无忌,权充新年贺词。敬祝海内外同行好友 2007 年身心康泰,百事顺遂!

2006 年除夕于桂子山

辛亥武昌首义史事考辨五则

冯天瑜

辛亥武昌首义去今未远,然而因种种缘故,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若干切关宏旨的细节,却一直众说纷纭。笔者在从事辛亥武昌首义史研习过程中,对历来聚讼未决的若干史事曾试作考证。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现择其要者披露于次,希冀方家教正。

一、《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侃

1911年春夏,湖北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清政府因铁路国有政策和立宪骗局大白于天下而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愤慨,该年1月21日,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被英巡捕打死,湖北当局竟偏袒洋人,助纣为虐,武汉各界市民同声谴责,而文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的《大江报》走在舆论界前列,对吴一狗事件作了真实报导,“一般社会颇为欢迎”。此后,保路风潮兴起,《大江报》又接连对盛宣怀、端方展开抨击。农历6月22日《大江报》发表副编辑何海鸣题为《亡中国者和平》的短论,揭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改良主义作法无补于事,警告国民如不亟起革命,必招致亡国。紧接着,农历闰6月初1日,《大江报》刊登《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猛

烈抨击清政府，并号召人民起而革命，该文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一篇重要文字，但作者属谁，一直无确切说法，除因当时《大江报》发表该时评未署名外，还与以下情况有关。

《大江报》因在辛亥年间发表惊世骇俗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忌恨。农历闰6月7日晚，清军警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审讯时，法官追问此稿作者，詹大悲答称“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①因该文作者究竟为谁，当时外界均不知晓，而詹大悲又一力承担文责，因而此后多种史籍均认为该时评出自詹氏之手。

然据文学社成员、詹大悲的朋友、黄侃的亲戚温楚珩20世纪50年代回忆，该时评系黄侃所作。当时黄侃刚由外地来汉，借住《大江报》馆詹大悲住处，詹设宴欢迎，黄在酒后感慨国事，草就《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成后黄侃即乘船离汉。^②另一辛亥老人朱峙山亦有类似回忆。朱称：“某日，黄侃与大悲饭后，带醉戏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黄次日即回圻春。文刊出，詹遂为夏口厅传讯，詹以责任所在，自认此文为己作。”由于这二篇回忆文字关于时评事件所述甚略，并未引起著史者重视，而《大江报》又早已湮灭，无以核查，故近几十年的多数著述仍沿袭“詹作”旧说。今据笔者家父之朋友，黄侃四子黄念祥先生70年代提供的黄侃未刊笔记证实，该时评确出自黄侃手笔，其全文如次：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昏度，软痼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衙，行见人人欢戴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

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辛亥闰6月初1日）^③

此外，以往皆以为该时评未署名。而黄念祥提供之黄侃未刊笔记证明：该时评署名“奇谈”。

二、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为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8月18日），10月8日（8月17日）失事之说不能成立

1911年夏季，文学社和共进会实现联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设立政治筹备处。按原定计划，起义将在该年农历8月25日（公历10月16日）举行。因孙武等党人在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引起爆炸，导致机关被俄国巡捕破获，党人数名被捕，印信文件均落入俄捕之手，俄国领事当即将被捕者及文件移交清江汉关道，江汉关道立即报告湖广总督署，清方得以按图索骥，在汉口、武昌大肆搜捕党人，迫使党人提前至8月19日（10月10日）举义。

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有农历8月17日、18日两种说法。前说如胡祖舜《六十谈往》、居正《辛亥札记》（后在《梅川日记》中改为8月18日）。但胡、居均非当事人，所记多有牴牾之处，不足信。孙武长女孙莒凡亦说是8月17日失事。其证据是：遵照其父之意，孙家每年8月17日设酒宴，请亲友为孙武压惊。但这毕竟是家属所言，并未得见孙武本人的相关记述。另外，黄玉山于1912年4月7日所写《黄玉山事略》说：“至17日，宝善里总机关事泄，孙君因炸受伤。”^④然而黄玉山也不是宝善里事件的当事人。

8月18日失事之说见于各种著述和回忆录。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宝善里事件的当事人李作栋和邓玉麟、刘燮卿的回忆。李作栋在1954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九日（农历8月18日）汉口机关遭到破坏时，我正在汉口，孙武受伤到医院去还是我送去的。”^⑤邓玉麟在1912年10月16日交给革命实录馆的

《邓玉麟革命小史》中更具体写道：“18日下午4时，孙武因制作炸弹硫酸过分爆发，伤面部甚剧。震动邻居，机关败露。”^⑥刘燮卿（即刘炳）在《刘炳事略》中说：“18日，武在总机关楼上制炸弹，失慎，药陡爆炸”。^⑦李、邓、刘都是当日参加宝善里机关活动的人物。邓在失事后还担负到武昌小朝街传递消息的任务，且所写回忆文字系事后一年，当较为可信。刘燮卿则是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失事后被捕者之一，其回忆更值得重视。

据孙武小女儿孙莒芹近年提供的孙武在1938年撰写的未刊手稿《武昌革命真相》称：“不料于18日下午3时，孙武在总机关调药过急，幸未装制之药轰燃，一时声闻全里，除孙武一人头部受伤外，全无伤者。”这一材料也可反证孙武长女孙莒凡记忆的8月17日失事之说不确。另据熊秉坤写于民国成立不久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8月18日汉（口）法（俄）租界总机关破坏……杨洪胜、邓玉麟通信来，谓：今日总机关不戒，于少弹药燃放。”^⑧说颇具可靠性，一者因其文写作时间距事发时间仅一年左右；二者因作者熊秉坤于事发当日直接从杨洪胜、邓玉麟那里获得消息，故熊文可作邓玉麟回忆文字的旁证。

综合多种原始材料的《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记载，孙武于8月18日下午一点钟，在俄租界宝善里亲自装置炸弹，因管心有未净之硫磺（磺）稍许与炸药相接，登时爆炸。^⑨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谢石钦等六人在宝善里事件一周年时，在宝善里机关旧址合影并在照片左面题字：“今月今日即去岁湖北革命第九秘密机关，首先败露之时，同人等特于其地；摄是影以志纪念。阴历壬子8月18日。起义人：谢石钦、丁佛藏、潘公复、陈宏诰、梅宝玘、钟堃谨志。于汉口宝善里14号。”^⑩谢石钦等人为宝善里事件的亲历者，又于翌年摄影留念，所记当为可靠。

据清官方及外国人的记载，宝善里事件时间也为8月18日（公历10月9日）。清湖广总督瑞澂8月19日给清廷的报告说：